

新绿洲



玉茗花开满庭芳

□ 袁 演



赣腔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

戏,其艺术表达呈现出三个审美特征:表演本体回归,演员唱腔功力与武技技艺均展现出深厚底蕴;舞台语汇有革新与拓展,多媒体投影技术与剧情巧妙融合,极大丰富了表现力;服装、化妆、道具、灯光等日益完善,共同构筑了令人沉醉的视听体验。

表演本体回归

戏曲艺术表演,唱腔与身段始终是塑造人物、传递情感的核心呈现手段。本届艺术节多部大戏在尊重剧种特色的基础上,实现了表演技艺的提升。在唱腔艺术的呈现上,多部作品展现出对剧种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。《南昌腔调》中,所有角色对南昌方言的精准运用,不仅赋予作品浓郁的地方韵味,更在抗战叙事中融入市井生活的诙谐与温情。弋阳腔现代戏《可爱的中国》在唱腔设计上充分彰显剧种特色,“红袄袄”“黄莺儿”“驻云飞”等经典曲调轮番亮相,并巧妙搭配上饶民歌元素,既贴合剧情推进,又细腻传递人物情感,实现了传统戏曲与红色主题的完美融合。

新编赣剧《李逵王》将莎士比亚《李尔王》的话剧形态,成功转化为以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为核心的赣剧形式,让莎翁经典在传统戏曲的演绎中焕发新颜。吉安采茶戏《有益同咸》融入“慢川调”“反川调”等吉安特色采茶曲牌与民歌,通过“分益”“埋益”等六幕戏,生动再现人民与红军“有益同咸,无益同淡”的鱼水情。万载花灯戏《谢灵运》则实现了山水诗意境与地方戏曲程式

的有机统一,剧中谢灵运的潇洒不羁、慧姬的深明大义等人物形象,皆通过细腻的唱腔与身段表演跃然舞台,赢得观众阵阵喝彩。《南柯记》的唱词饱满丰厚,“锦堂月”“江儿水”“园林好”等丰富多变的赣剧唱腔尽显剧种独特韵味。新编大型现代赣剧采茶戏《浅水湾的春天》,演员表演细腻传神,举手投足间尽是乡土气息;原汁原味的方言俚语贯穿全剧,从家长里短的闲聊聊到干事创业的讨论,每一句都透着浅水湾的烟火气,精准还原了乡村的原生态风貌。

舞台语汇革新

当代戏剧的场景设置已不再局限于背景衬托,而是逐步发展为具有独立表意功能的叙事维度。本次展演中,多部大戏在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上展现出高度的创新性,民族歌剧《八一起义》广泛运用多媒体投影技术,将历史背景、文献资料与写实画面投射于屏幕,以现代舞美语言诠释了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,强化了叙事的清晰度与视觉冲击力,营造出恢宏庄严的舞台氛围。万载花灯戏《谢灵运》创新采用动态投影与虚实布景结合,将谢灵运诗中的青山绿水搬上舞台,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诗人笔下的山水画卷;音乐上融合传统曲调与古典乐器元素,既保留了非遗的乡土韵味,又增添了文人雅韵。

弋阳高腔·乡音版《紫钗记》注重细节与意象的统一,浅紫色调的场刊、提词器屏幕与背景投影剧目封面相互呼应,将紫钗意象从戏内延伸至戏外。启幕前,多媒体投影率先呈现《紫钗记》的多元形态,让经典的多元面貌深入人心;大幕开启后,技术进步与舞台叙事深度融合——上元灯节的热闹盛景、边关的巍峨城楼等场景通过投影生动展现,如同动态的戏文注解,让观众随主人公的悲欢同步沉浸。儿童剧《郑和·东方宝船》则以多媒体投影呈现繁华的大明航海时代,生动展现郑和七下西洋的宏大场面。

舞美造型出色

出色的舞台美术不仅能营造剧情氛围,更能通过视觉符号传递深层意蕴。在舞台呈现与服装灯光造型方面,多部作品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。弋阳腔现代戏《可爱的中国》的舞台场景切换流畅自如,精准复刻革命战争年代的质感——云梯与冲锋的红军还原了战争的激烈,热烈喜庆的布景勾勒了新婚的温情,满山满树的红杜鹃象征革命胜利的希望。尤为称道的是双线人物同场的设计,前景与背景的叙事交织,为观众带来丰富多维的观剧体验。

新编采茶戏《樟树大码头》,大场景繁华热闹,和城堂风格古朴,以细腻布景传递出人物的境遇与情感。加之多媒体投影技术的运用,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赣商在赣剧及樟树药帮的风采。《烛照丹心》中,“灯”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诗化意象,兼具信物、火种与象征的三重深意,将赣剧的艺术韵味与人物精神内核紧密相连。复排赣剧《清风亭》的灯光设计与剧情贴合度精妙,如“拾子”一幕结尾,灯光聚焦于高举婴儿的张元秀身上,既具象化了“爱子高过天”的心理,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。

话剧《钨金》在舞台上呈现出革命崇高性与人物生活化的平衡,大锤、长钎等工具既是生产符号,更象征工人阶级的力量;落幕时的人物群像搭配暗红色调光影,传递出历史的厚重感与革命意象。儿童剧《酷虫学校之最强魔法》的舞台布景绚丽逼真,虫卵球灯、蝴蝶虫茧、旋转果壳海盗船等共同构建起昆虫微观世界;演员身着绚丽连体服劲歌热舞与观众互动,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。复排赣南采茶戏《茶童哥》,舞台设计巧思十足,斜坡状步道还原茶山形貌,茶童哥的矮子步表演更是将其机智果敢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我们看到,多元剧种的对话、传统与现代的融合、技术与艺术的共生,为江西戏曲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更多新的活力。同时,展演也暴露出当下部分剧目存在题材选择上有趋同性倾向,剧本的文学厚度与叙事张力仍有提升空间、戏剧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仍需加强等问题。

论“盘箕晒谷”与庐陵文脉传承

□ 雷静远

在吉安地区的乡土语境中,“盘箕晒谷,教仔读书”,并不是单纯的母慈子孝耕读场景呈现。这短短八字,像一把精神密钥,开启的是一扇通往庐陵文化传承千年不绝的奥秘之门。“盘箕晒谷,教仔读书”,以一种近乎执拗的对比,将生存的窘迫与文化的崇高并置。它是一幅生活图景,为我们理解吉安“文章节义之邦”美誉形成提供了关键线索。

歉岁与书声:一种文化选择的价值宣言

“盘箕晒谷”,不是丰饶闲适的田园诗,它直指歉收与饥谨。在一般的丰年时,农民会将稻谷摊在晒谷场进行晾晒。然而一旦遇上灾年,粮食收成不足,就只能用容量很小的盘箕来晾晒谷物。小小盘箕承载的是微薄收成,生存压力如巨石压身,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,吉安的百姓们依然坚持“教仔读书”,这就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文化现象:在生存困难的背景下,他们把后代托付给了教育,将教育提升至与生存同等甚至优先的等级。这句话便如价值宣言,它告诉人们,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与崇高性,是这块土地赢得未来的根本。

吉安文风兴于唐。大唐圣历年间,著名诗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被贬吉州司户参军,他便在吉安“置相山诗社”,招收学生,教习诗文,首开私人讲学之风。唐大历年间,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改任吉州司马,“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”,增建学舍,聘用贤士,“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”。

画荻与节义:士人典范与地域精神的互构

崇文重教,是庐陵人的民间智慧,它在历史的星空中有着璀璨的投影——欧阳修早年丧父,与母亲相依为命,因家中穷苦,买不起纸笔,于是欧阳修便以荻草秆为笔,铺沙当纸,教欧阳修习字。母亲的教诲使得欧阳修从小勤奋好学,为他后来成为文坛领袖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而“画荻教子”的故事,正是“盘箕晒谷,教仔读书”传统的生动体现。铺沙当纸与盘箕晒谷,它们的内核一脉相承:物质可以匮乏,但求学的路径不能中断。后来,欧阳修《吉州学记》一文中,提出了“本于人性”的教学方法论,将学校教育与国家兴衰直接关联,深刻影响并激励着一代代吉安学子,使得民众皆“家诵诗书”。

至南宋嘉熙四年(1240),吉州太守江万里创办白鹭洲书院,以“气节”与“忠义”为育人根本,强调读书明理。在他的倡导下,书院树立了奋发图强、为国建功立业的好学风。宝祐四年(1256),白鹭洲书院39人同登进士金榜,文天祥高中状元,震动朝野。而后,江万里与文天祥等白鹭洲书院的师生子弟多践行了“文章节义”精神,他们用生命表明:书中涵养的浩然之气,能支撑起人格与民族的脊梁。至此,吉安地区的文教传统,从“求仕”的层面,淬炼到“塑魂”的高度。

制度与民风:崇文重教的社会性沉淀

至明清,吉安地区崇文重教之风进一步得到发扬,从士人阶层延展至民间,成为社会性的全体沉淀。

最明显的体现,是求学风气的普遍形成及制度的民间建构。明时,“朝士半江西,翰林多吉水”,大部分官员致仕后都积极在家乡倡修书院、捐赠学田、主持讲学,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教育质量和声望。明嘉万年间,王阳明门人为举办讲学,弘扬心学,在吉安地区修建了多所书院,如复古书院、青原会馆、西原会馆等,小型的私塾、学塾更是遍布于各地。民间书院、学塾的兴起,使得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进一步下沉到更广泛的阶层,让崇文重教从理念固化为深入骨髓的民风。

同时,吉安各县宗族普遍设立学田、义仓等,用族产收入保障本族子弟读书科举,则体现出民间重教传统制度化、组织化——即使个别家庭遭遇困境,宗族力量也能确保有潜力的子弟不致在“盘箕晒谷”年景下独自挣扎以至失学。族规家训中,“崇文重教”成为核心条款。光绪《吉安府志》对于各县形成的民间重教之风多有记载,如庐陵县(今吉安)有“虽极贫苦者,皆知教子读诗书”之说,泰和县“虽闾阎之陋,山谷之穷,序塾相望,弦诵相闻”等。这些无不透露出当时普通百姓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渴望,体现出“盘箕晒谷,教仔读书”的崇文重教精神跨越千年的一脉相承。

总之,“盘箕晒谷,教仔读书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启示,最终超越了地域俗语的范畴,揭示了通过教育连接家族传统与民族大义的东方智慧。这种勤恳耕读的传统,在如今的时代语境中,愈发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。它让我们在喧嚣中坚守教育初心,在发展中原厚植文化根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——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,文脉传承,不仅需要教育资源的投入,还需要坚守这份读书明理、立德树人的信念。

微评论

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时代表达

□ 黄仕琼

“诗文随世运,无日不趋新。”作为承载文明的活态载体,语言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,忠实映照社会变迁的轨迹。数字浪潮席卷之下,网络用语应运而生、蓬勃生长,既填补了一些传统表达的空白,也为汉语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活力。

在“班味”一词流行之前,要形容打工人长期因工作压力导致的憔悴和疲惫状态,我们只能借助“疲惫不堪”“无精打采”等笼统表述,很难精准勾勒那种专属职场人的精神状态。而“班味”二字以凝练的表达,将工作对人的身心影响具象化。再如一句简单的“那咋了”,填补了拒绝内耗、坚持自我的表达空白。面对他人不必要的质疑或评价,以往要么强硬反驳要么默默忍受,而“那咋了”既能表达不被他人意见左右的态度,又不失分寸,轻松化解尴尬,传递松弛的心态。

包容网络用语,其实是对汉语发展规律的尊重。纵观语言发展史,今天被奉为规范的成语、俗语,不少在诞生之初是通俗甚至“非主流”的表达。从“草木皆兵”“画蛇添足”等源自历史叙事与民间寓言的成语,到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“趁热打铁”等脱胎于市井生活与行业经验的俗语,无一不是经过时间沉淀、大众筛选,才慢慢升格为规范用语。直至今日,“给力”“正能量”已成为全民常用词,最初不过是网络论坛的小众表达;“内卷”“躺平”则直击社会心态,从最初的网络热词逐渐走进新闻评论、学术研讨等严肃场景,成为解读时代特征的重要符号;“村BA”“显眼包”“群主”这些词也因形象生动、表意精准,被不少主流媒体接纳使用,渐渐成为全民熟知的通用表达。这些案例充分证明,网络用语与历史上的通俗表达一脉相承,其能否沉淀为规范语言,自有时间与大众的筛选,不必急于以“不规范”为由轻率否定。

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,人们迫切需要更高效、更生动的交流方式,网络用语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。当然,包容不等于放任自流。有些网络用语存在低俗化、碎片化、违背公序良俗的问题,往往会在大众的自发筛选中被逐步淘汰。真正的包容,应是秉持“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”的理性态度,对那些表意精准、积极健康、符合语言规律的网络用语,给予其生长与沉淀的空间;对低俗恶俗、破坏交流秩序的表达,则需要通过平台审核、网民自律、教育引导等方式予以规范。我们坚守语言的规范性与庄重性,是为了守护交流的底线,我们接纳网络用语的创新价值,是为了激活语言的活力,二者并非对立,而是相辅相成。

对网络用语多一份包容,本质上是对语言生命力的尊重,也是对时代创新精神的接纳。我们不妨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语言演变,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时代表达,在规范中引导创新,在包容中沉淀经典,让汉语既保留深厚的文化根脉,又焕发蓬勃的时代光彩。



文艺观察

《红币1932》:苏区金融史诗的当代回响

□ 卢武 萧健宇



在赣鄱大地的红色叙事谱系中,微短剧《红币1932》以创新姿态扛起先行者的使命。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备案的重点微短剧、江西省出品的首部红色题材微短剧,它将镜头对准1932年瑞金的隐秘战场,在竖屏尺寸之间实现红色历史与现代传播的巧妙对话。作品既延续了江西文艺深耕本土革命历史的传统,又回应了微短剧时代的审美需求,为当下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,探索了一条极具潜力的开掘路径。

长期以来,红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多聚焦正面军事战争的烽火硝烟。《红币1932》秉持历史自觉,将目光投向金融战场,让红色题材创作维度得以多元拓展。1932年的瑞金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刚刚成立,国民党便实施“暗流计划”,通过伪造银毫破坏经济秩序,妄图瓦解革命根基。剧集以此为核心冲突,让观众清晰看见红色政权“一手拿枪杆子,一手抓钱袋子”的革命智慧,更印证了金融护航对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。

在这场危机中,两位热血青年因“打击假银毫”事件意外相遇:女主沈清歌以身份局,身份历经三重反转(西医医生、国民党特务、中共地下党员),最终以鲜血守护金融防线;男主谢明修则抽丝剥茧,破解迷局,随后毅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,以武装行动践行抗日理想。剧中将个人命运、金融斗争与抗战大局深度绑定,内容叙事牢牢扎根苏区金融史实,凸显江西作为红色金融源头的历史定位:通过人物对话和道具特写,呈现1932年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国家形态发布《对日战争宣言》的重要时刻;借助实景拍摄,让瑞金革命旧址、苏区金融遗址等红色地标成为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剧集成功让红色题材跳出单一战役叙事,展现出革命历史中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交织共生的丰富图景。

微短剧的崛起正为红色光影注入新鲜活力,其快节奏、高密度、强情节、多转折的叙事特质,精准契合年轻群体“速读、速看、速览”的视听行为取向,更天然承载“以艺育人”的传播使命。

事实上,表达主题是影视作品创作之必然,其本身并不构成“说教”——“说教”的症结不在于“说了什么”,而在于“怎么说”。《红币1932》以独特“亲和力”消解“说教感”:叙事结构上,以青春叙事为载体,采用“金融谍战+抗战先锋”的双线并行模式,戏剧冲突与悬疑张力贯穿始终;故事视角上,摒弃宏大叙事,聚焦个体命运,鲜活呈现人性光辉、信仰力量与生命张力。剧集成功让年轻受众愿意看、看得进,实现从“要我学”到“我要学”的转变。故事情节起伏间、人物命运转折中,观众情绪同步波动,打通“情节——情绪——情感”的共振链路,在拉近抗战岁月、革命英雄与年轻受众时空距离的同时,更助力青年在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互动中,探寻“美好中国从何而来”的历史之问,汲取“吾辈青年去向何处”

的精神动力。

曾几何时,微短剧一度是“掐脖子的霸总、扇巴掌的女主、挑事的婆婆、吃瓜的围观群众”等内容,剧情充斥着喧嚣、躁动与荒诞。《红币1932》打破微短剧价值空心化的发展困境,以文化内核厚重感消解作品的浮躁感,实现了短小且有营养的传播效果。

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节点,《红币1932》的深层价值在于将尘封的红色历史与当代社会形成精神共鸣,激活了红色记忆的当代回响。剧集以艺术之名发挥精神引领作用,让红色教育从教科书转变为人民喜闻乐见的“连环画”,为微短剧传递时代价值树立了范式。剧中并未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,而是回归有血有肉的个体:当谢明修带着“胜利即归”的誓言踏上征程,当沈清歌用鲜血守护印钞机密,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平凡人物的壮举,更是家国大义的崇高精神。这种精神通过竖屏传播抵达年轻观众,让青年在角色成长中看见自己的影子,更以年轻化表达让苏区精神在新时代表生发芽。

江西是一片红色热土,有着红色题材影视创作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灵感富矿。近年来江西造红色影视多点开花,精品频出:从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志愿军:存亡之战》,到电视剧《大道薪火》《追风者》《沉默的荣耀》,再到微短剧《红币1932》《山河不忘》,讲红色故事用心用力,传红色精神入脑入心入魂。作为江西红色文艺创新的探索之作,《红币1932》证明红色题材也可以兼具历史深度与传播活力。它以传统与创新并举、质量与流量兼备的创作实践,在讲好江西故事、打造江西品牌的同时,更让红色文化在光影流转中焕发新生,筑牢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根基。